

2024 年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国际贸易竞赛 国际贸易与商务专题赛道

论文题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潜力的影响研究

指导老师：戴越

团队成员：韦玉洁、邹谨煊、嵇皓月、
陈润宇、孙锦阳

联系电话：18254738757

邮箱地址：3127676962@qq.com

时 间：2024 年 11 月 3 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的影响研究

韦玉洁、邹谨煊、嵇皓月、陈润宇、孙锦阳

指导老师：戴越

摘 要：本研究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的影响。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 36 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效率，结果显示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研究还发现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数字技术指数在此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地理距离被证实对数字服务贸易有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数字经济、一带一路、贸易潜力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覆盖多国多领域。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下，数字经济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尤为重要，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技术普及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提供支持，但发展不平衡问题显著。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数字化发展水平，凸显了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因此，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还能为各国应对未来类似危机提供借鉴。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它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拓展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畴，特别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背景下数字经济的作用机制，从而丰富了现有文献。实践上，研究结果为沿线国家政府提供了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的重要信息，有助于识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技能培训和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的不足，并据此制定政策。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区域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数字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同发展。

1.3 研究创新

本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的领域中，展现了以下 3 方面的创新：

(1) 研究视角创新。本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从多维度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指数，如数字技术指数和数字治理指数，这一创新视角使得研究能够从更全面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区域合作的视角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应用背景，强调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一体化建设中的合作潜力，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2) 研究方法创新。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并使用“一步法”，测算了双边国家间的出口贸易效率。并加入中介效应分析，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如何通过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及数字技术指数间接推动国际贸易。这一实证研究与区域合作分析相结合，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3) 研究内容创新。本研究在内容上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结合，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 36 个国家，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3 年至 2021 年，提供了广泛的实证数据和分析。研究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机制，为理解数字经济如何具体推动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2 文献综述

2.1 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速发展和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学界对数字经济发展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指出，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经济结构；陈晓红等（2019）指出，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新引擎”^[1]。

数字经济与数字服务贸易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Wei和Liu（2023）的研究显示，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贸易利益具有正面效应^[2]；莫馥宁和陈瑶雯（2024）指出，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人口规模及“一带一路”国家身份等因素均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正面影响^[3]；范鑫（2020）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指出进口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国出口效率损失^[4]；王微微和李雨晨（2023）测算了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指出中国与贸易国的数字贸易效率普遍较低，但潜力巨大^[5]；王小梅和张岩（2024）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速服务业创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和拓展服务国际市场，提升出口国服务出口效率^[6]。程时雄、陈琬怡证明微观方面，数字经济以新产品赋能贸易规模、外贸结构；宏观方面，数字经济给国家提供新平台促进外贸提质增效^[7]。

2.2 文献述评

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数字经济作为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实证分析相对不足。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一带一路”沿线 36 个成员国 2013-2021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旨在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为理解数字经济如何具体推动国际贸易提供了进一步理论支持。

3 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3.1 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一带一路”36 个国家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然后根据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际贸易值与潜在贸易值的比值测度贸易效率大小。选择的国家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巴林、中国、塞浦路斯、捷克等 36 个国家。

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借鉴现有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一带一路”36 个国家双边服务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中纳入“一带一路”36 个国家贸易的服务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成员国人均GDP、人口数量、地理距离等自然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如下：

$$\ln \exp_{ijt} = \beta_0 + \beta_1 \ln pgdp_{it} + \beta_2 \ln pgdp_{jt} + \beta_3 \ln pop_{it} + \beta_4 \ln pop_{jt} + \beta_5 \ln discap + \beta_6 comlang + v_{ijt} - u_{ijt} \quad (1)$$

构造基于非效率项的扩展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金融自由度、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技术指数，出口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解释变量，使用“一步法”研究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设定贸易非效率模型构建如下：

$$u_{ijt} = \alpha_0 + \alpha_1 Open + \alpha_2 ict_{it} + \alpha_3 tech_{it} + \alpha_4 ser_{it} + \alpha_5 fin_{i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取性，最终选用 2013-2021 年我国与 36 个“一带一路”伙伴国贸易面板数据。相关变量解释说明如下：

表 1 各变量解释说明

类别	变量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exp	“一带一路”出口国对进口国的服务出口额	WTO-OECD 的 BaTIS 数据库

自然因素	pgdp	进/出口国人均 GDP	世界银行数据库
	pop	进/口国人口数量	世界银行数据库
	lndiscap	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法国 CEPII 数据库
人为因素	ict	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fin	出口国金融自由度	加拿大 Fraser Institute 数据库
	open	出口国对外开放度	加拿大 Fraser Institute 数据库
中介变量	ser	出口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世界银行数据库
	tech	出口国数字技术指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哑变量	comlang	两国是否有共同语言	法国 CEPII 数据库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适用性检验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对该模型进行似然比（LR）检验，评估该模型的适用性。（1）检验贸易非效率是否存在；（2）检验贸易非效率项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3）是否加入共同语言虚拟变量假设贸易非效率不存在，贸易非效率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检验结果如下表 2，结果显示 LR 的统计量均超过 5% 的水平，拒绝原假设，说明贸易非效率项存在且会随时间变化，这表明对“一带一路”的各个国家贸易进行分析适用于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之后，进一步引入哑变量：共同语言。经检验后的结果显示接受原假设，说明该假设对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影响并不显著，无需引入共同边界变量和共同语言变量。

表 2 极大似然比检验

原假设	约束模型	非约束模型	LR 统计量	检验结论
贸易非效率不存在	-11526.971	-10473.641	2106.66	拒绝
贸易非效率不变化	-11530	-11360	340	拒绝
不引入共同语言	-11360	-11340	40	拒绝

4.2 自然因素分析

利用Stata 17 对时不变模型、时变模型进行估计，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 3 是回归的结果，时不变模型和时变模型中的 γ 值分别为 2.366、2.433，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一带一路”成员国贸易的出口还有很大的空间，但贸易非效率项显著存在，对于出口的影响很大，是阻碍贸易的主要因素，应该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η 为 5.759，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出口非效率在随着时间以 5.759 的速度递减，因此适宜采用时变模型进一步研究。同时也代表着“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在不断的缩减，贸易条件在不断的改善，贸易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下表是分析后得出的时变模型的估计结果，并对时变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出口国人均GDP ($lnpgdp_{it}$)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国的经济规模增长对扩大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潜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进口国人均GDP ($lnjpgdp_{j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同时也证实了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进口国GDP的增长反映了“一带一路”国家国内收入水平和需求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对出口国数字服务产品的进口需求的增长。

第二，出口国人口数量 ($lnpop_{it}$) 的回归系数在时不变模型中为 0.751，在时变模型中为 0.680，虽然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可能表明出口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并未显著影响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产品的能力。进口国人口数量 ($lnjpgdp_{jt}$) 的回归系数在时变模型中为 0.462（标准误差为 0.029），显著为正。这表明进口国人口规模的增长可能并未直接带动国内市场需求，反而可能因为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受限，抑制了进口需求。

第三，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lndiscap_{ij}$)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出口产品至“一带一路”国家起到负向作用。我们可以认为地理距离是影响出口的一个显著因素。

表 3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时不变模型	时变模型
$lnpgdp_{it}$	0.964*** (0.035)	0.847*** (0.036)
$lnjpgdp_{jt}$	1.030*** (0.035)	0.847*** (0.036)
$lnjpgdp_{jt}$	0.549*** (0.026)	0.462*** (0.029)
$lnpop_{it}$	0.751*** (0.031)	0.680*** (0.031)

Indiscap _{ij}	-0.001*** (0.001)	-0.001*** (0.001)
comlang	1.948*** (0.314)	2.066*** (0.321)
常数项	-31.825*** (0.825)	-26.048*** (0.984)
σ	1.383*** (0.041)	1.397*** (0.042)
γ	2.366*** (0.047)	2.433*** (0.048)
η	-	5.759*** (0.336)

4.3 贸易非效率模型

贸易非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4，其中，出口国对外开放度 ($open_{it}$) 的系数为 12.867，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度的提升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出口额。这可能是因为提高开放度意味着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和较少的贸易限制，帮助出口国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增加服务出口额。同时，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可能伴随贸易政策优惠，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出口效益。

出口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ser_{it})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显示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显著正向影响服务出口额。服务业在出口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可能通过提高服务的质量和多样性，增强了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两国是否有共同语言 ($comlang$)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共同语言的存在显著降低了贸易非效率，促进了服务贸易。共同语言减少了沟通障碍和交易成本，使得贸易双方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谈判和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增强信任和合作意愿，降低贸易壁垒。

注意到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ictit$) 的系数为 0.01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指数的每一单位增加与其服务出口效率正向相关，即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显著促进了服务出口效率的提升。这一正向影响可能源于数字经济提高的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数字技术在服务交付和交易过程中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扩大了市场范围。此外，出口国数字技术指数 ($tech_{it}$) 的系数为 0.008，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服务出口能力，增强服务的可贸易性，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交付的时间和成本，增强出口国在全球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

表 4 贸易非效率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exp _{it}
lnpgdp _{it}	0.285*** (0.035)
lnpgdp _{jt}	1.298*** (0.023)
lnpop _{it}	0.775*** (0.019)
lnpop _{jt}	0.526*** (0.011)
lndiscap _{ij}	-0.786*** (0.025)
comlang	1.247*** (0.100)
ict _{it}	0.010*** (0.004)
tech _{it}	0.008** (0.003)
open	12.867*** (0.612)
ser _{it}	1.978*** (0.287)
fin _{it}	0.165*** (0.019)
常数项	-38.467*** (0.700)
μ	-6.313 (4.885)
Usigma	2.490*** (0.459)
Vsigma	0.482*** (0.082)
样本量	8032.00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 < 0.1$, * $p < 0.05$, $p < 0.01$ 。

4.4 贸易潜力测算

本文通过对 3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3-2021 年的服务出口效率进行测算，计算出各国服务出口的平均效率值，并以此对比分析国家间的服务出口效率差异。效率值在 0 到 1 之间，值越大表示服务出口效率越高。

表 5 2013-2021 年“一带一路”双边国家贸易效率排序（前 40 位）

排序	出口国-进口国	效率	排序	出口国-进口国	效率
1	塞浦路斯-俄罗斯	0.8169657	21	泰国-新加坡	0.0872393
2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0.3295179	22	印度-阿塞拜疆	0.0846285
3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0.2840272	23	新加坡-孟加拉国	0.0754769
4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	0.2735951	24	阿尔巴尼亚-中国	0.0726126
5	阿尔巴尼亚-希腊	0.2602363	25	印度-泰国	0.071875
6	新加坡-泰国	0.2282625	26	印度-塞浦路斯	0.0709352
7	阿尔巴尼亚-土耳其	0.2231521	27	印度-中国	0.0691001
8	俄罗斯-塞浦路斯	0.2196545	28	菲律宾-泰国	0.0687332
9	拉脱维亚-塞浦路斯	0.2093325	29	印度-印度尼西亚	0.06755
10	捷克-斯洛伐克	0.2021316	30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0.0668603
11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0.1855415	31	新加坡-俄罗斯	0.0652777
12	新加坡-越南	0.1824983	32	印度-马来西亚	0.0639675
13	新加坡-塞浦路斯	0.1777516	33	新加坡-匈牙利	0.062858
14	阿尔巴尼亚-塞浦路斯	0.155067	34	巴林-塞浦路斯	0.062048
15	斯洛伐克-捷克	0.1475834	35	保加利亚-格鲁吉亚	0.060799
16	印度-沙特阿拉伯	0.1339698	36	印度-越南	0.0587063
17	阿尔巴尼亚-波兰	0.0997988	37	菲律宾-中国	0.0552776
18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	0.0957189	38	爱沙尼亚-塞浦路斯	0.0540072
19	塞浦路斯-黎巴嫩	0.0948708	39	拉脱维亚-俄罗斯	0.0538913
20	黎巴嫩-塞浦路斯	0.0911202	40	新加坡-捷克	0.0538201

塞浦路斯-俄罗斯配对以 0.8170 的高效率值位居榜首，显示出两国之间高效的贸易往来。这可能与两国之间的紧密经济合作、地理邻近性以及政策支持有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配对分别以 0.3295 和 0.2840 的效率值位列第二和第三，这些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突出。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俄罗斯和新加坡-捷克配对的效率值较低，分别为 0.0540、0.0539 和 0.0538。这些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壁垒、基础设施不足或经济政策限制等挑战。

4.5 数字服务创新的中介机制检验

陈晓红等（2019）讨论了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运营与服务创新管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强调了数字技术如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对数字经济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指出这些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是衡量数字服务创新的重要指标。刘波和洪兴建（2022）在使用增长核算框架测度2001—2020年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程度，指出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大于数字产业化的直接贡献，提供了使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数字服务创新的实证依据^[8]。

因此，本文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数字技术指数来衡量数字服务创新（ $esva_{it}$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自变量为出口国数字经济指数（ ict_{it} ），中介变量为出口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ser_{it} ）以及出口国数字技术指数（ $tech_{it}$ ），因变量为出口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exp_{it} ），其他皆为控制变量。各变量构建公式如下：

$$ser_{it} = \alpha_0 + \alpha_1 ict_{it} + X_{ijt} + \epsilon_{ijt} \quad (3)$$

$$exp_{it} = \gamma_0 + \gamma_1 ict_{it} + \gamma_2 ser_{it} + X_{it} + \epsilon_{it} \quad (4)$$

$$tech_{it} = \beta_0 + \beta_1 ict_{it} + X_{ijt} + \epsilon_{ijt} \quad (5)$$

$$exp_{it} = \tau_0 + \tau_1 ict_{it} + \tau_2 tech_{it} + X_{ijt} + \epsilon_{ijt} \quad (6)$$

表 6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exp_{it}	(2) ser_{it}	(3) exp_{it}	(4) $tech_{it}$	(5) exp_{it}
ict_{it}	0.041*** (0.005)	0.001*** (0.000)	0.038*** (0.006)	0.438*** (0.024)	0.042*** (0.006)
$xiaolv$	-16.122*** (3.765)	0.033 (0.099)	-16.198*** (3.756)	28.011** (13.974)	-16.049*** (3.765)
$lnpgdp_{it}$	0.669*** (0.074)	-0.051*** (0.002)	0.785*** (0.094)	-2.666*** (0.334)	0.662*** (0.076)
$lnpgdp_{jt}$	0.556*** (0.075)	0.001 (0.002)	0.555*** (0.075)	0.132 (0.237)	0.557*** (0.075)
$lnpop_{it}$	-0.694* (0.377)	-0.142*** (0.012)	-0.371 (0.360)	-7.588*** (1.655)	-0.714* (0.379)
$lnpop_{jt}$	0.223 (0.352)	0.005 (0.008)	0.211 (0.349)	2.755** (1.188)	0.231 (0.352)
ser_{it}			2.276** (0.885)		
$tech_{it}$					-0.003 (0.004)
_cons	-3.201	3.214***	-10.515	126.038***	-2.870

变量	(1)	(2)	(3)	(4)	(5)
	exp_{it}	ser_{it}	exp_{it}	$tech_{it}$	exp_{it}
	(9.255)	(0.257)	(9.120)	(35.714)	(9.282)
N	8950	8950	8950	8950	8950
R ²	0.970	0.977	0.970	0.988	0.970
F	41.526	157.105	37.711	100.333	36.199

*** $p<0.01$ ", "** $p<0.05$ ", "* $p<0.10$

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后，在模型（1）中没有考虑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出口国数字经济指数（ ict_{it} ）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exp_{it} ）的影响系数为 0.041（ $p<0.01$ ），表明出口国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模型（3）引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ser_{it} ）作为中介变量后， ict_{it} 的系数变为 0.038（ $p<0.01$ ），而 ser_{it} 的系数为 2.276（ $p<0.01$ ）。这表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 ict_{it} 对 exp_{it} 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指数的增加通过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而促进了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在模型（5）引入数字技术指数（ $tech_{it}$ ）作为中介变量后， ict_{it} 的系数为 0.042（ $p<0.01$ ），而 $tech_{it}$ 的系数为-0.003。这一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指数在 ict_{it} 对 exp_{it} 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指数的增加直接影响了数字技术指数，进而影响了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总结

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 36 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多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发现，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实证分析表明，贸易非效率项显著存在并随时间变化，对外开放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共同语言的存在及金融自由度等因素显著影响降低贸易非效率、提高服务贸易效率。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理距离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传统且重要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呈下降趋势，地理距离的增加直接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信息不对称、文化交流障碍以及政策法规差异随之变得更加显著，增加了跨国贸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2）中介机制的作用。本文发现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数字技术指数在数字经济指数与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提升反映了其重要性和数字化转型程度。数字技术指数的提升意味着更高的贸易效率和市场接入能力，促进了服务的数字化和国际化，使其更易进入国际

市场。特别是数字技术指数显示出完全中介效应，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的进步来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5.2 政策建议

（1）加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能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范围，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并适应全球化的市场变化，增强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各国政府和企业应积极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措施，推动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提高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获取更多国际市场机遇。

（2）投资数字技术研发。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增加资金和资源投入可加速技术创新，提升数字技术指数，促进数字服务创新、提高贸易效率，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速度和透明度，增强服务的可达性和个性化^[10]。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还有助于服务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等新渠道拓展业务，增强全球竞争力。因此，各国应重视数字技术的研发，采取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措施，以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

（3）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投资高速互联网、宽带网络、数据中心以及云计算平台等关键技术，能提供技术支撑。提升网络的速度和覆盖范围，能提供稳定可靠的平台^[9]。同时，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还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创新和创业，为数字服务贸易创造新的增长点。因此，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需要共同努力，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政策环境，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为数字服务贸易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陈晓红,唐立新,李勇建,等.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运营与服务创新管理的理论与实证[J]. 中国科学基金, 2019(3):7.
- [2] Wei, Q.Q. and Liu, L.L. (2023)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SEAN Countrie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China's Export Trade Benefits.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5, No. 16.
- [3] 莫馥宁,陈瑶雯. 中国对 RCEP 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探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 (04): 63-70.
- [4] 范鑫. 数字经济发展、国际贸易效率与贸易不确定性 [J]. 财贸经济, 2020, 41 (08): 145-160.
- [5] 王微微,李雨晨.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 (21): 108-112..
- [6] 王小梅,张岩.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出口效率的影响 [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 (15): 155-160..
- [7] 程时雄,陈琬怡. 数字经济助推贸易强国建设:逻辑、困境与破解之道 [J]. 国际贸易, 2024, (05): 5-14.
- [8] 刘波,洪兴建.中国产业数字化程度的测算与分析[J].统计研究,2022,39(10):3-18.
- [9] 汪亚美,余兴厚.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市碳排放的时空动态效应——基于“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7[2024-11-03].
- [10] 杨菁. 基于提升规模效益的超大城市治理结构数字化转型 [J]. 探索, 2024, (05): 40-43+72-73.